



# 西风吹书

● 崔权醴 / 编译

# 读哪页

《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00 Years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00 YEARS*

# 西风吹书读哪页

——《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

崔叔醒 编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向鸿 王国瑞

封面设计：康笑宇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百年书评精选/崔权  
醴编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3

ISBN 7-80100-406-X

I. 西… II. 崔… III. 书评-美国-选集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430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北京卫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30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5000 册

ISBN7-80100-406-X/G·143

定 价：20.00 元

## 出版说明

对文学界来说，《纽约时报》的书评是值得关注的栏目。时至今日，这个栏目也已经历了百年岁月，有心人将它悉心整理，编译成册，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西风吹书读哪页》。

《时报》书评能在西方乃至世界社会上取得今日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绝非偶然，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它选择有名气有份量的作品；其二，它登载有个性有品味的书评。就前者而言，它几乎收录了西方文坛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以来各个阶段的一时之选；以后者来说，则是以千字小文评万言巨制的识见，或冷峻，或热烈，或戏谑，或谨严。但无论是何种风格，哪样行文，都能自成一家，独具慧眼，令读者感觉别有天地，耳目一新，从而使作品与书评达成瑜亮互见的境界与二美并收的效应。

正如《纽约时报》的编者所言，《时报》书评在文学评论上绝不追求时尚，而是努力向读者提供材料，让他们据此作出判断。而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也正好与之相吻合。正所谓一百个不同的读者，就有一百部不同的《红楼梦》，本书所选的篇章，评论的观点，乃至行文的风格，译笔的基调，也正等待着读者的见仁见智，细加揣摩。

《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一张大报，其新闻报道及观点有许多我们是不赞同的。对于书评的观点我们也不是一一赞同。但是我们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文体知识以及多年来文学小说的展示，相信读者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并能够消化吸收其精华，而弃之糟粕。

这就是本书的出版目的。

## “文学副刊”已成年：《书评》小史

1896年，阿道夫·S·奥克斯接管《纽约时报》时所烧的三把火之一便是为书另辟专版。他决意提高报纸的覆盖面，对他来说，书籍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但他的前任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他判断对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出版业突飞猛进，读者群也相应稳定扩大。书的数量成倍增长，而书就是新闻。

当然，《书评》本身算不上是创举。奥克斯以前的老式时报也有一定数量的书评。但它们只得出现在本已拥挤不堪的新闻栏目中间，和其它100多个标题为争取空间及显眼的位置而拼搏奋斗。为书新辟一个专版意味着更多的书可以得到评论。评论的长度也比以前长些，同时，它也将有关书和作者的故事都集中到一起，不象以前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

它还吸引了很多出版商来做广告。诚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裹足不前，怀疑接着在报纸的主要版面上做广告效果是不是更好——这些版面人人都读。但很快他们就改变了主意。

但经济上的考虑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现在我们可以肯

定地判定，新专版的设立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会给报纸带来声誉。它是不凡的标志，表明《纽约时报》有着很强的文化使命感。

1906年，庆祝“专版”10周年的时报，声誉这出戏是大唱特唱。周年纪念刊在编辑部有关的简短声明下面便是一连串当时名人的贺信，每封贺信后面都是那些人签名的摹本（似乎没有这个，题词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同时又用粗体标题打出：“卡内基先生认为它给时报增光添彩”，“舍夫先生说它为提高时报的品位作出了巨大贡献”，“玛丽·E·维尔金斯认为《书评》很有份量”，“科尔·哈伟说它的影响不错”，“波特主教没有哪个星期六不读它”。（1906年的“专版”还和刚开始创办时一样，只在星期六出版。）

将贺信一一列出是公关上的杰作，但它同时也表明当时主管文学副刊的人对文学的感情还有限，正如报纸不无得意地指出来的那样，贺信多来自文学圈子之外，来自“教堂、酒吧、公园，还有商界”。当时被推崇的作家如今多已淹没无闻。他们中，最显赫的要数小说家詹姆斯·雷恩·爱伦，《肯塔基大主教》的作者——他的信被影印了下来。

但另一方面，期待文学副刊像文学月刊或是高傲的季刊一样也不现实。它的目标是吸引时报所有的读者，因此，即使早期的编辑是严谨的学者或是无畏的先锋（尽管现在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激进），他们也不得不和大众的趣味妥协。

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读者不感兴趣。在创办初期当只有8页的专版被叠好和其它栏目放到一起时，它很容易被

人抛弃，许多读者就是这样做的。爱尔莫·戴维斯在他的《纽约时报史》(1921)中说，读者星期六去城里上班时——那时候星期六人们还得工作——经常只是扫上一眼（或者根本就不看），就让它“随风飘去”。这种习惯随处可见，结果有家幽默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并称为《文学副刊》——为戴维斯援引——画上一个公民正从厚厚一堆被扔掉的《纽约时报星期六书评》中艰难地走出高架列车车站。

时报的人当然不会喜欢这个玩笑，但他们没有退缩，《书评》增加到了16页。1919年又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措施，它成了星期天出版的时报的专版，而且增加了插图。以前的第一版是零星报道，现在让位给了份量最重的评论。它的页数在不断增加——32页，有时甚至是56页，到1920年它早已改变了“被抛弃”的历史，成了厚厚实实的一大摞。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迷住了。亨利·路易·门肯便是一例。尽管他也为时报写过书评，但那并不妨碍他把它当成文化平庸主义的堡垒。1917年，他猛烈攻击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利昂·费尔普斯，门肯最大的指责是费尔普斯放弃了以前的高标准——他是严肃研究现代小说的先驱——接受了“《纽约时报》文学副刊的标准。举个例子来说，在最新出版的书中，费尔普斯将欧文伟思特置于西奥多·德莱塞之上，并将查尔士·D·司徒沃特(他是谁?)吹捧为马克·吐温”的衣钵传人。

门肯并不以评判上的公平而著名(而且作为《时报》明星书评家的费尔普斯也比他指责的要强得多)。然而门肯



的不满却在他的同辈人中很有市场，尽管其他人也许不能像他那样将它强烈地表达出来。在当时美国文学正经历一场文艺复兴，国外在发生革命性的运动时，《时报》的《书评》似乎是在一味地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当然，对某些个别现象这些批评并不适用：间或为《书评》写文章的人形形色色。但例外不能改变它的基调——这一基调由闲聊式的新闻片断和没什么份量的文学专栏得到了加强。

有一项特色尤其将那种过时的调子推向奇怪的极端。早些时候，作为拉拢读者政策的一部分，《书评》设立了一个部叫“有问必答”，为读者提供其不太清楚的文学信息。问题和答案都来自读者。如果它们能作为判断的依据，19世纪最唠叨最多愁善感的一面还活得好得很，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本奇利写了一篇极棒的滑稽模拟《文学失而复得部》；它的优秀部分在于，像所有好的戏拟一样，它没有对原作的效果进行不恰当的夸张。《文学失而复得部》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出现在《金婚》的标题下。K·L·F——谁下述文字的作者？它是什么意思？

噢，金色的婚礼

噢，金色的婚礼

噢，金色的婚礼

金色的，金色的婚礼！

典型的答案出现在《祖母还是女孩时》的标题下：

“路特·F·尼姆，弗卢申，L·I——E·J·K询问的

诗，在 1850 年 7 月堪萨斯阿什堡的自由土壤骚乱时有人背诵过。它的题目叫《祖母还是女孩时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作者是利昂得·B·里泽德主教，最后几行是这样的：

“祖母还是女孩时，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其他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有：奥尔巴尼的利利昂·W·以思特、纽约的马丁·B·弗洛奇；纳罕特的亨利·卡伯特·洛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六十年代《有问必答》还挺受欢迎，而且形式大体上没变。1963 年，德怀特·麦当劳写他著名的敌视书评的文章《纽约时报，唉》时，毫不费力地引用了最近的“疑问”，如果罗伯特·本奇利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到欣慰。没错，这一特色项目只是书评上出现的众多项目之一。但因它每周不落，故而成为《时报》特色最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古怪而又惹人喜爱的方式，它加强了人们对《时报》的印象，即在《文学》上，它已大大落后于时代。

事情发展的自然过程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任何象书评一样广泛的综合性报纸必定要反映出新名词、新主题、新态度，即便是仅仅通过被评的书。其中不少东西在二十年代看来已是现代得危险，到五十年代，批评家对它最一致的攻击不是它太超前，而是它太温和。

例外总是有的——令任何报纸都引以为荣的例外。间或也有人试图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十年代，《书评》大大得益于极为敏锐的助理编辑哈维·布莱特。但布莱特一直没成为编辑，《书评》又回到了它的老路，在文学界的上

层——不仅仅在上层——不满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的作家都发表了文章抱怨说《书评》不够好。德怀特·麦当劳的作品便是一例。此次战役中弹药的其他提供者有《美国学人》上的齐奥费里·瓦格纳；《哈珀杂志》上的伊丽莎白·哈得维克，以及《代达勒斯》上的约翰·霍兰德(名单可以很容易地拉长)。

开始时批评还受到抵制，但最终它们还是达到了效果。文化环境此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七十年代，《书评》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变。1971年，约翰·利奥纳德被任命为编辑，标志加大改变对旧有约束限制的开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利奥纳德先生和他的继任——哈维·沙皮罗、米切尔·利维塔斯及利贝卡·柏柏·辛克勒——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独特的编辑风格，但无论他们的差异有多大，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比他们中任何人和此前《书评》70多年主导思想之间相似的地方都要多。

《时报书评》遇到的某些困难，任何属于报纸一部分的书评都会遇到，比如，如何协调高品味的文学标准和特殊的文学兴趣与对这些标准不感兴趣但又想了解一些书的情况的普通读者的需要？

在这方面将《纽约时报》的经历和《伦敦时报》相比是很有启发意义的。1902年，和美国一样，英国也出现了出版业的发展，为了对此作出反应，《伦敦时报》也创办了文学副刊，但它允许此刊的编者，一个很有学者趣味的人，去按自己的政策行事，结果是副刊反映了报纸对文学和学术的尊敬，但同时也使许多读者不知所云。《伦敦时报》在一战

前不久采取措施，将副刊分出去成为独立的周刊，同时在每日报纸的版面上继续刊登书评，当然数量比以前少了。

整整 80 年来，《纽约时报文学副刊》中的“副刊”这个词都被误用了。我在七十年代自己接手编辑这份报纸时才明白它能在大西洋彼岸引起很多误解。美国的读者，尤其是学术圈子里的人，经常问我为什么《纽约时报》不能对同一类型的书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评论——对这个问题简短的回答是《文学副刊》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杂志、发行量相对较小。更为合理的比较（尽管其它的文化差异得考虑进去）是将《纽约时报书评》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像书一样厚的报纸相比。

没有报纸能让文学精英满意。撇开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书评从一开始就信奉书前宣称的应该被当作新闻的哲学——这一哲学来自《时报》恪守的不偏不倚进行报道的信条。第一任编辑费兰西恩·W·霍希受到同仁的赞扬，因为他使《时报》成为“迅速扩张的书之世界的报纸”。在这种经营原则的指导下，“书第一次被当成新闻来处理，也是第一次从报界人士的观点来处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很多相关作者及出版商的新闻。例如第一期的第一版就清一色是这些内容（包括李鼎高写的放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孤寂》标题下的一篇报道，新闻来源据说是一位英国官员，他因为职务的关系对事实比较清楚），但是“书就是新闻”的政策意欲将书评用在更广也更成问题的领域。1916年，《书评》20周年的一篇社论以命令式的口吻传达了官方的信条。它声称，“《书评》已为它自己在当代散文文学

领域争得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它接受一切不偏不倚，并努力向读者介绍所评之书内容的批评文章……它特立独行，在文学评论上绝不追求时尚，而是努力向读者提供材料，让他们据此作出判断。”换句话说，我们提供事实，你们来下结论。

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但在实践中它却经常被当成因循守旧、模棱两可、避免下结论的秘诀，同时它也是最天真的幻想。书评不可能成为没有倾向性的报道，因为有关某书的“新闻”很大一部分都是它有多好，即使是对内容的概括，除了最最简单的概括以外，都要涉及个人的判断和喜好。绝对的不偏不倚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这并不是说什么样的评论都行。正直的编辑总是尽一切可能避免发表糟糕的评论，或是意在报答——或乞求——个人恩惠的评论，或者是源于个人仇怨的评论，不管它有时会多么有意思。但说到意见的忠实表达，即便是做到相对的公正也比虔诚的评论者想象的要难得多。

让我们假设一个比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都简单得多的情景。假设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大体上分为思想极端对立的两派——绿派和蓝派，那么在评论他们的书这个问题上，编辑该怎么办？如果将绿派的都送给绿派书评家，蓝派的都送给蓝派书评家，他的报纸上就不会有多少思想上的争论。如果他将绿派的都送给蓝派书评家，而将蓝派的都送给绿派书评家，结果必然同样可以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最佳的解决方案便是将蓝派的都一半送给蓝派书评家，一半送给绿派书评家，反之亦然。这样

他至少可以在思想的争论及生动程度上综合取舍，达到整体上的平衡。饶是如此，发现自己的书被交给绿派书评家的蓝派作者也会因感到不公而痛苦，书被交给蓝派书评家的绿派作者也会茫然不解：“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

批评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正，什么是绝对的公正，人永远也无法达成共识。不严格地说，一碗水端平是个令人羡慕的目标，但最好将它交给编辑和书评家个人的良心及明智的判断。企图将它系统地强加于人只会换取令人窒息的恶果。

“书就是新闻”哲学的第二个结果，便是对书评家概念的歪曲。判断退居次要地位。争议不受欢迎。风格及批评的天份几乎不会引起注意。然而涵盖了很多问题的书如果要予以充分地报道，专门知识这个因素就不能被忽视。这些年来，《书评》由于对专家的信任而著名起来，即使一个很随意的书评家，也必须和他的传记资料一起出现。似乎他从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专门的知识（评论意大利小说的人便被描述为“跟上国外小说的发展”）。《书评》显然以在需要专家时能发现真正的专家为荣。五十年代，曾流行一个有关编辑政策的笑话：“若是你得到一本有关直升飞机的书，你会怎么办？从直升机上找一本《书评》。”

并非专门知识本身被人唾弃，绝对不是——其它的可能性更糟糕。在英国，非专业人士的书评有着很长的传统，在伟人名称的光环下沾沾自喜固然容易——如锡德尼·史密斯和V·S·普里切特之类，但因此也很容易忘记卑下的一面。有效的纠正措施也有，它以乔治·奥维尔1946年

写的一篇精彩悲观的论文出现，论文称为：《书评家忏悔录》。它描述的是一位记者与编辑送给他并附言“它们在一起应该很合适的”五本书的搏斗：

“《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学乳品制造业》、《欧洲民主简史》(这本书厚 680 页,重 4 磅)、《葡萄牙属东非的部落习俗》，另外还有一篇可能是误收的《躺下更舒服》的小说。他的书评——比如说,800 字——得在明天中午完成。”

这是一种很冷酷的生活方式，它最糟糕的一面还是那些可怜的家伙得“连续不断地发现他们对之根本没有共鸣的作品的感受”。

相形之下，专家便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他对自己的主题不仅很了解，而且很关心。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有许多书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评论。但这里也可能藏有暗礁。专家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书评家。有时候他们显然是个很差的书评家，而对他们过于依赖的报纸就难逃枯燥文章的恶运。好的文学编辑不可或缺的一项品质，便是清楚地明白，书评本身也是一项专门知识——至少是一项技艺。

对专家的崇拜，也会从另一方面，使人对编辑的看法过于狭窄。他很容易使人按类型分配角色，使人怠于跨过思想的樊篱。但多数时候，最激励人心的作家都是那些拒绝受束缚的人，即使是专家，他们也能超越自己的专门知识。在五十年代，有人曾问当时《书评》编辑弗兰西斯·布朗，他是否会考虑让一位数学家来评论一本诗集，或是让位诗人来评论某本历史著作，他回答说：“不。我的感觉是，隔行如隔山。”这样的回答令人沮丧，读到它时，我想起了

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一句话：“我不是驴子，但我还没有自己的土地。”

自那以后书评继续发展，那些日子现在看上去是如此的遥远。往日争议的尘嚣早已落定，我们至少可以承认：“书就是新闻”的方针尽管不好，但它总比好的原则被误用了强。给人们带来书的有关信息——正面的信息事实上总是批评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新的不为人熟悉的书在让人分析之前必须有所描述，与极尽吹捧之能事相比，作出令人信服的描绘，也很可能成为引起读者兴趣的最有效的方式。从威廉·海茨利特到艾德蒙·威尔逊，这些批评家胜人一筹的都是艺术。在稍低一点的层次，报纸书评家在首次和如此之多的书打交道时，最为需要的也便是这种艺术。避开判断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判断一无所有的批评也令人沮丧。去激励，去辩论，去庆祝（仅在应该庆祝的时候），去布道（只是偶而为之），去解释，去逗乐，去宣扬新的思想，去让对话继续进行——它们也是这工作的一部分。同时更是任何优秀的书评家向往的理想状态的很大一部分。

（约翰·格罗斯，1996年10月6日）



目 录

出版说明.....(1)  
《文学副刊》已成年：“书评”小史..... (1)

**1896 - 1919**

1900年：一切在海上——

《吉姆老爷》，

约瑟夫·康拉德 著..... (2)

1903年：觉醒——

《我生命的事情》，

海伦·凯勒 著.....(6)

1903年：时代的悲剧——

《黑人的灵魂》，

威·爱·伯哈·杜波依斯 著..... (9)

1912年：心灵之潮——

《卡拉马佐夫兄弟》，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15)

1913年：一个男孩最好的朋友——

《儿子和情人》，